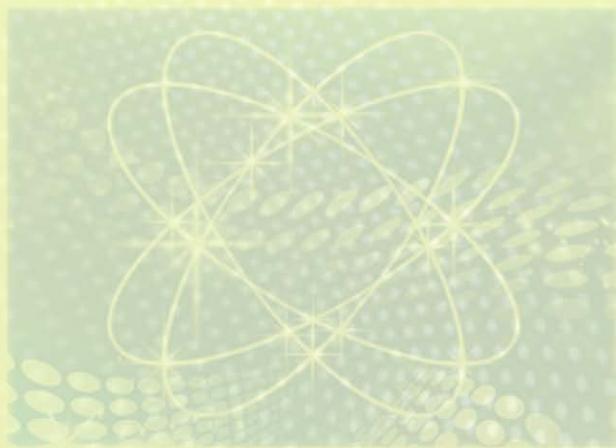


王忠孝公集

王忠孝 著 陳忠義 林興中 點校



上海辞书出版社

王忠孝公集

王忠孝 著 陳忠義 林興中 點校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忠孝公集 / (明)王忠孝著;陳忠義,林興中點
校.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6
(泉州文庫)
ISBN 978-7-5326-3850-5

I. ①王… II. ①王…②陳…③林… III. ①雜著—
中國—明代—文集 IV. ①Z429.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33949 號

叢書題字 饒宗頤

特邀編輯 王瑞祥

責任編輯 竺金琳

裝幀設計 吳永安

王忠孝公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市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
電話: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排版

泉州晚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9.5 字數 000 000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850-5/K·899

定價: 00.00 元

如發生印刷、裝訂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聯繫電話: 0595-22371950

前 言

泉州建制一千三百多年，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和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比屋絃誦，人文為閩最”，素稱海濱鄒魯、文獻之邦，代有經邦緯國、出類拔萃之才。歐陽詹、曾公亮、蘇頌、蔡清、王慎中、俞大猷、李贄、鄭成功、李光地等一大批傑出人物留下了大量具有歷史、文學藝術、哲學、軍事、經濟價值的文化遺產。據不完全統計，見載於史籍的著作家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著作多達三千七百三十九種，其中唐五代二十九人三十二種，宋代二百人三百九十一種，元代二十一人四十種，明代五百三十六人一千五百八十五種，清代六百四十人一千六百九十一種；收入《四庫全書》一百一十五家一百六十四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五十六家七十四種，《續修四庫全書》十四家十七種。二〇〇八年國務院頒佈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屬泉人著述、出版者十三種。

遺憾的是，雖然泉州典籍贍富，每一時代都有一批重要著作相繼問世，但歷經歲月淘汰、劫難摧殘，加上皮藏環境不良，遺存至今十無二三，多成珍籍孤本。這些文化遺產，是歷史的見證，是泉州人民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亟待搶救保護，古為今用。

對泉州地方文獻的蒐集與整理，最早有南宋嘉定年間的《清源文集》十卷，明萬曆二十五年《清源文獻》十八卷繼出，入清則有《清源文獻纂續合編》三十六卷問世。這些文獻彙編，或已佚失，或存本極少。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泉州成立“晉江文獻整理委員會”，準備整理出版歷代泉人著作，因經費短缺未果。八十年代，地方文史界發起研究“泉州學”，再次計劃編輯地方文獻叢書，可惜後來也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其事遂寢。但是這兩次努力，為地方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做了準備，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和書目彙編。

二〇〇五年三月，中共泉州市委、泉州市政府決定將地方文獻叢書出版工作

列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一項文化工程。翌年，正式成立“泉州地方典籍整理出版委員會”，着手對分散庋藏於全國各大圖書館及民間的古籍進行調查蒐集，整理出《泉州文庫備考書目》二百六十七家六百一十四種，以後又陸續檢索出遺漏書目近百家一百八十餘種。經過省內外專家學者多次論證，最後篩選出一百五十部二百五十餘種著作，組成一套有一定規模、自成體系、比較完整、可以概括泉人著作風貌、反映泉州千餘年文化發展脈絡的地方文獻叢書，取名《泉州文庫》，二〇一一年起由上海辭書出版社陸續出版發行。

整理出版《泉州文庫》的宗旨是：遵循國家的文化方針政策，保護和利用珍貴文獻典籍，以期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增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增強文化軟實力，爲泉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泉州文庫》始唐迄清，原著點校，收錄標準着眼於學術性、科學性、文學性、地域性、原創性、權威性，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和著名歷史人物的代表作優先。所錄著作涵蓋泉州各縣(市、區)，包括金門縣及歷史上泉州府屬同安縣，曾在泉州任職、寄寓、活動過的非泉籍人氏的作品，則取其內容與泉州密切相關的專門著作。文庫採用繁體字橫排印刷，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哲學、宗教、軍事、語言文字、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領域，其中不乏孤稀珍罕舊槧秘笈，堪稱溫陵文獻之幟志。

值此《泉州文庫》出版之際，謹向各支持單位、個人和參加點校的專家學者表示誠摯的感謝！由於涉及的學科和內容至爲廣泛，工作底本每有蛀蝕脫漏，加之書成衆手，雖經反覆校勘，但限於水平，不足或錯誤之處還是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教。

泉州地方典籍《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

二〇一一年三月

整理凡例

一、《泉州文庫》(以下簡稱“文庫”)收錄對象為有關泉州的專門著作和泉州籍人士(包括長期寓居泉州的著名人物)著作,地域範圍為泉州一府七縣,即晉江(包括現在的晉江市、石獅市、鯉城區、豐澤區、洛江區)、南安、惠安(包括泉港區)、同安(包括金門縣)、安溪、永春、德化。成書下限為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前(個別選題酌情下延)。選題內容以文學藝術、歷史、地理、哲學、政治、軍事、科技、語言教育等文化典籍為主,以發掘珍本、孤本為重點,有全國性影響、學術價值高、富有原創性著作優先,兼及零散資料匯總。

二、每種著作儘量收集不同版本進行比較,選擇其中年代較早、內容完整、校刻最精的版本為工作底本,並以有關史籍、筆記、文集、叢書參校,文字擇善而從。

三、尊重原著,作者原有注釋與說明文字概予保留。後來增加者,則視其價值取捨。

四、凡底本訛誤衍漏,增字以[]表示,正字以()表示,難辨或無法補正的缺脫文字以□表示,明顯錯字徑直改正,均不作校記。

五、凡底本與其他版本文字差異,各有所長,取捨兩難,或原文脫訛嚴重致點讀困難,或史實明顯錯誤者,正文仍用底本,而於篇末校勘記中說明。

六、凡人名、地名、官名脫誤者,均予改正,訛誤而又查不到出處之人名、地名、官名及少數民族部落名同異譯者,依原文不予改動。

七、少數民族名稱凡帶有侮辱性的字樣,除舊史中習見的泛稱以外,均加引號以示區別,並於校記中說明。

八、標點符號執行一九九六年實施的國家《標點符號用法》。文庫點校循新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例,一般不使用破折號和省略號。

九、選題原文不分段者,文庫點校,按文意自然分段。

十、凡異體字、俗體字、通假字，如非人名、地名，改動又無關文旨者，一般改爲通用字；異體字已經約定俗成、容易辨認者不改變。個別著作爲保持原本文字語言風貌，其通假字則不校改。

十一、避諱字、缺筆字儘量改正。早期因避諱所產生的詞彙成爲習慣者不改正。

十二、古籍行文中涉及國家、朝廷、皇帝、上司、宗族等所用抬頭格式均予取消。

十三、文庫一般一冊收錄一種著作，篇幅小的著作由兩種或若干種組成一冊，篇幅大的著作則分成兩冊或若干冊。

十四、文庫採用橫排、繁體字印刷出版。每冊前置前言。每種著作仿《四庫全書》提要之例，由編者撰寫《校點後記》，簡略介紹作者生平、著作內容及評價、版本情況，說明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泉州地方典籍《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辦公室

二〇〇七年二月五日

王忠孝與《王忠孝公集》

方寶川

一、王忠孝的生平

王忠孝，字長孺，號愧兩，福建惠安人。據《王氏譜系》記載，他生於明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卒於明永曆二十年，即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①。享年七十四歲。

王忠孝少而好學，聰穎質慧。八九歲能誦讀《孝經》、四書等，甚得父母及二兄長的喜愛。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就童子試。三十九年，成婚。次年，丁母憂。四十六年，邑試入泮，錄高等，名列第五。天啓元年（一六二一），丁父憂。六年，入闈。督學葛寅亮，錄之優等，首拔食餼。七年，以《詩經》中式，領鄉薦。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會試第一百三十八名，殿試二甲第四十名，登進士。二年，授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題守正陽永定門。應變接濟軍糧有功，次年被大司農題薦督運大通橋，旋改授薊西密雲糧儲。任內悉心平核，宿弊一清，條悉抵光，歲省五萬金，然由此得罪了內璫鄧希詔等權貴昏闖。一日正旦朝賀，希詔與薊督爭班次，忠孝折之。希詔遂借機多次陷害，最終以揚州衛指揮陳述職運糧遭雨事件，被捕入獄。忠孝在獄中力上二辯疏，申明其冤。大司農畢自嚴、經略曹文衡、兵備馮師孔、都憲王志道、緹帥王世盛等，亦多次論救，纔免於一死。後改繫刑部，拘禁二十八月。擬戍附邊建陽衛，逾年希詔罪被誅，忠孝得以釋歸。

明朝滅亡後，江南明朝殘餘勢力擁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再建南明小朝

^①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九《人物》和清高拱乾等：《臺灣府志》卷八《人物》的“王忠孝傳”，均將其卒年誤記為清康熙六年（一六六七）。

廷，年號弘光。時閣部史可法，特疏薦王忠孝。由於王忠孝歷來與閩黨抗爭，故再遭閩黨餘孽馬士英、阮大鍼等排擠，調署紹興守。馬、阮又遣中宮於嘉、紹二郡相迫。忠孝入浙界，不得行其志，以疾告歸。弘光政權滅亡，浙中義師公推張煌言等人去台州迎立魯王朱以海在紹興就監國位。同時，福建的鄭芝龍、黃道周等則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建元隆武。唐王擢王忠孝為廣東嶺東道參議。一再疏辭得請，改光祿寺少卿。又疏辭，不允，始入福州就職。隆武二年（一六四六）正月，隨唐王北上抗清駐蹕建陽時，奏呈《上唐王條陳六事疏》，提出“用人宜慎、佈置宜審、額餉宜核、將領宜汰、言路宜清、圖治宜實”等六項治政方略^①。又極力主張不能保守一隅，坐而待斃，力請唐王決策由江西、浙江出兵，圖復兩京。由於隆武政權實際掌握於無意抗清的鄭芝龍等武將手中，唐王無可奈何。只有黃道周挺身而出，自請出師，北伐抗清，寡不敵衆，兵敗江西馬金嶺，被俘就義。鄭鴻逵率殘部退扼閩北仙霞嶺，軍心渙散。唐王特賜劍印王忠孝，命其巡視仙霞二渡關，便宜行事。王忠孝則力辭劍印，單騎自浦城至仙霞，悉心咨詢，宣諭安戢。因有巡關之勞，進太常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同年六月，浙江魯王政權潰敗，清兵直逼福建。鄭芝龍暗中盡撤仙霞嶺上守軍，致使清兵長驅直入福建，不戰而下福州。八月，唐王在汀州被清軍俘虜後遇害，隆武政權告終。王忠孝回歸故里，避於寺廟。次年，浮海南逃的魯王又在閩南招集殘餘，繼續抗清。敕晉王忠孝為兵部尚書，改職左都御史，總督興泉義兵。王忠孝疏辭未受。時鄭成功在廣東南澳起兵抗清，不久連破福建的同安、海澄、漳浦、泉州等地。王忠孝則在惠、泉率義師響應。然奉魯王入廈門的鄭彩，與鄭成功發生衝突，致使在惠、泉的王忠孝部屬屢遭鄭彩兵將的襲擊和掠奪，終因糧草不濟，退守莆田。魯王部將又持檄赴莆收餉，王忠孝被迫解散義師，渡海隱居廈門。永曆四年（一六五〇），桂王朱由榔遣官敕忠孝為兵部右侍郎。疏辭不允，道阻不得赴。時鄭成功已建立了以金、廈兩島為中心的抗清根據地。永曆五年三月，王忠孝移居金門，寓賢厝鄉，隱於村落，耕漁自給。後南下銅山，借居黃道周的祠宇。永曆九年鄭成功在廈門，承明制，建五

^① 本書卷三《上唐王條陳六事疏》。

軍，設六官；又置儲賢、育胄二館，以招納明室遺臣、縉紳，培育陣亡將士後代。王忠孝與盧若騰、辜朝薦、沈佺期、徐孚遠、紀許國等人，均入儲賢館。鄭成功“皆優贍之，歲歲有常給，待以客禮。軍用大事，時輒咨之，皆稱之為老先生，不言名^①”。王忠孝對鄭氏軍政大事，亦多所策劃，及時匡救，故為鄭成功所推重。永曆十二年至十四年（一六五八—一六六〇）間，連呈《上桂王瞻天路遠疏》、《上桂王興朝赫濯有象疏》、《上桂王心懸迹阻疏》、《上桂王綸綍遠頒恩疏》等，奏請桂王克定楚粵、收復閩疆，並向桂王表明“臣之苦心，有未易明言者。……旅栖多年，蓋有不得已於斯也。……一腔熱血，欲灑奚從？……臣今老矣，報國有心，赴闕無路^②”的心迹。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鄭成功收復臺灣，招請王忠孝赴臺。未及行，鄭成功逝世。鄭經入臺後不久，清軍佔領金、厦兩島，王忠孝移舟而北。三年，經澎湖至臺灣，投奔鄭經，栖居東寧（臺南）。在臺期間，日與盧若騰、辜朝薦諸公相過往，賦詩著書，以盡天年。五年，卒於臺灣。後歸葬故里惠北松亭。

二、《王忠孝公集》抄本概況

據王忠孝《遺囑（一）》自稱及王孔仁《王氏譜系》、洪旭《王忠孝傳》等記載，王忠孝著有《四居錄》、《孝經解》、《易經測略》、《詩經語錄》、《四書語錄》及奏議、詩文若干卷，俱未梓行。目前僅存的詩文抄本十二卷，原題為《惠安王忠孝公全集》，筆者經眼的有廈門大學圖書館和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兩種藏抄本（以下分別簡稱“厦大本”和“師大本”）。“厦大本”用的是方格稿紙，鋼筆抄成；其中卷九至卷十一，為另一種字體，另一種稿紙，並注有：“據惠安政協抄本傳抄”。“師大本”用的是毛邊紙，毛筆抄成；其中卷一、卷二、卷六、卷七、卷九至卷十二為同一種字體；卷三至卷五、卷八則為另一種字體；全書行款相同，均為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八字。許仲凱先生叙及“師大本”的來由時說：“余五九年訪書至螺陽，僅得舊抄本卷九至

① 夏琳：《海上輯要》卷上。

② 本書卷四《上桂王綸綍遠頒恩疏》。

十一計三卷，是集據廈大歷史系藏本傳抄^①。”所謂“廈大歷史系藏本”，即今廈大圖書館藏本；所謂“舊抄本卷九至十一計三卷”，是否即“廈大本”中提到的“惠安政協抄本”？至今存佚情況？則不得而知。茲比較“廈大本”和“師大本”，筆者發現“師大本”在傳抄的過程中作了標點，後又經朱維幹教授作了簡單的校勘；而“廈大本”僅在每句之間間以空格。“師大本”的書品也明顯好於“廈大本”。因此，我們將該抄編入《福建叢書》第二輯時，選擇了“師大本”作為影印底本。

該抄本究竟是如何流傳下來的，尚不得其詳。據該抄卷首《說例》等，只能略知一二。其《說例》之一曰：“本集係清光緒初年，忠孝公族裔王楚書重行手鈔，經南安石井孝廉鄭超英圈批，近為王添裕同志珍藏，特加鈔錄。經王珪璋同志甫校，響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來迎接祖國文化建設。”可見該書光緒初年的王楚書重抄、鄭超英圈批的本子，在建國之初尚藏於王添裕家中。“文革”動亂之後，該藏本不知去向。其與“惠安政協抄本”的關係如何，或就是同一抄本，“廈大本”是否傳抄於王珪璋的校本，均未可知，有待繼續考證，希望知者賜教。另外，該抄本卷首《附告》之八還記載：“彙抄與彙編之分別，彙抄屬書備，彙編即整理性質。本集屬彙抄，不是彙編。名不可居，絕對不能書‘王□彙編’。若欲書‘王□彙抄’，亦不妥。但在辭名之下對責，還是見《說例》附載。”說明了該抄本並未經過編輯這一重要的整理工序，傳抄者只是將當時經眼的王忠孝的作品彙抄一起，這也就是現存該抄中目次顛倒、內容編排雜亂、目錄與正文不符、且脫文較多的原因所在。例如：“師大本”卷三、卷四、卷七的目錄與正文的次序就多不對應；卷十二目錄中的《王氏譜系》一文當為王忠孝嗣子王孔仁所撰，而其正文却見於卷四，且誤為王忠孝自撰；卷首“作者紀名”中的“王忠孝”條目，則與卷十一《詩類》末附的“作者紀名”中的王忠孝條目重複；卷五目錄中的《與林胤昌》一文，以及卷十一目錄所列附“詩類別輯”中的徐可大《王愧翁公祖調餉畫邊一時並懋日當初度詩以贈之》、徐永壽《壽王愧翁公祖一律並求郢政》、施肩吾的《謝王愧兩司馬見贈》和《盧若騰司馬惠朱薯賦謝（附錄）》、劉若宰《贈愧翁老年兄》、林之豸《輓愧兩先生詩》、鄭超英《謁

① 許靈：《福建文獻目叙錄》之一，載《福建文史》第一期。

愧兩王司馬祠》、蘇鏡潭《咏王忠孝詩》，卷十二“傳志類”目錄中的劉若宰《王忠孝傳》以及《誥命》(一)(二)(三)(四)、《敕命》(一)(二)、《卓績》、《流寓》、《崇祀》、《惠北梅峰鋪前亭山契字》(一)(二)、《惠北梅峰鋪前亭山繳字》、《惠北梅峰鋪前亭山盡字》，附卷“文類”目錄中的王憲章《祖母林孺人壙志》和《石鏡山記》、王璋《黃雲蒸墓志銘》、王爵《攬勝樓記》，“詩類”目錄中的王璋《鷄籠積雪》、張占采《題沙堤攬齋詩》和《和前韻》、陳家祥的《春暮沙堤送疇臣往省》、《中秋即景咏四截句》和《中秋即景咏》、陳開運《七夕微雲感興二首》，“傳志類”目錄中的《卓績》(《惠安縣志》)、《列傳》(《臺灣縣志》)以及張閻仙的《惠安人物風土考》等，集中均缺正文；而卷十二正文中所收入的洪旭《王忠孝傳》，則未列入目錄，王忠孝的《自狀》，却與卷二中的《自狀》相重複。諸此可證，該抄在成書過程中，曾編入王忠孝同時代和後人所撰寫的有關紀念性文字及部分地方文獻資料，但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又散佚甚多。爲了厘清該抄上述存在的雜亂情況，便於讀者閱讀參考，此次筆者對該抄作了較大的整理工作，重新編定目次，調整正文，刪除重複，使之對應。又考慮到該抄原本就没能涵括王忠孝的全部著述，現存的詩文部分又缺文頗多，再沿用原題《惠安王忠孝公全集》，似乎不妥。特將此意見提請《福建叢書》第二輯編委會討論後決定，改題爲《王忠孝公集》。上述編改，是否合適，尚請方家指正。另外，筆者把已列入該抄目錄而不見正文的所有篇名，不厭其詳，縷列於上，則旨在方便民間尚有該書殘餘者，按圖索驥，補遺拾缺，希望該抄能逐漸成爲完璧。

三、《王忠孝公集》的主要內容及其史料價值

經過此次重新整理編輯、影印出版的《王忠孝公集》，凡十二卷。卷一、卷二，“序、志、記”等十七篇；卷三、卷四，“奏疏、啓、書”等十二篇，並附載畢自言等疏救回奏文五篇、《敕諭》(唐王)一篇、《大明魯王履歷》一篇；卷五至卷八，“書翰”一百八十三通，附載《相國黃景昉來書》等七通；卷九至卷十一，詩作九十五題百餘首；卷十二，收錄了王孔仁《王氏譜系》、洪旭《王忠孝傳》、王忠孝《自狀》等。其主要內容及其史料價值，可舉要如下：

首先，南明福王、魯王、唐王、桂王諸政權，自建立之初就內外交困，危如累卵。

尤其是福王、魯王、唐王等政權的實際存在時間，均短在一年左右。王忠孝親歷這些政權之事，身臨其間，對於他們的腐敗無能和病入膏肓的本質，有着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分析。因此，在王忠孝的著述中，保留了大量有關史事的原始資料，可供研究者參考。

例如：福王的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之初，正是危急存亡之秋。正需君臣團結，共同抗清之際，閩黨馬士英等人却倚占其擁戴之首功，獨攬政權，排擠名爲首輔的東林黨史可法。閩黨專權，既置國事於不聞不問，又以中興爲名，肆意搜括，大修宮殿，奢侈浪費，昏庸荒淫。鬧得整個南京城，閭井騷然，“斗米五錢，民半饑死^①”。弘光帝被玩於股掌之中，東林黨紛紛告退，閩黨則乘機安插黨私，公開賣官鬻爵，政治昏暗到了極點。王忠孝曾在《覆閣部蔣德璟書》中慨嘆：“今都下不堪言矣！……東南小半壁，不知當何如支撐也。”在《與總憲李愷軒書》中曰：“今天下民生瘁極矣，吏治壞極矣！……今每營兵信滿千，輒置大帥、參游千把，動以百計。薪水什流，既居三四，欲兵之強，何可得也。……催使四出，中官督視，多官多役，多制多費，豈覆轍不足畏耶！”又在《覆吏部林胤昌書》中指出：“今天下事，如坐漏舟破屋。大家合力收拾，猶恐莫及，而乃付奴寇於不聞，持門戶若水火，恣睢乖張，全無顧忌。從來中興景象，有如是乎？”可見他對時政之弊，不僅痛恨憂心，而且洞察分明。抱有中興幻想的他，也曾積極建議當政者要在政治上，“從頭整頓，內則政府大僚握其樞，外則撫按司道持其柄。以公正而行黜陟之權，以表率而示取捨之的。立以不移，期於必赴，乃能運其樞於天下^②”。軍事上，“最要在汰冗將、省營頭……刻下先從京營整刷，推以外鎮亦然。經制既定，遴選將領以統之。明賞罰，假便宜，設間諜，遠探偵，知己知彼，可戰可守。如是，而壁壘必煥然改觀矣，而後急議足餉^③”。財政上，“今江南漕糧，不須遠運，所省腳價之數，略可當一省錢

① 本書卷五《與閣部蔣德璟書》。

② 本書卷六《與總憲李愷軒書》。

③ 本書卷六《與總憲李愷軒書》。

糧^①”。但是，他的這些合理建議，不為當權者所採納，只好以“病骨支離，不堪為吏^②”為由，乞休歸里。實際上，他的《與相國黃景昉書》說過：“以邇見邸報，中使新出督餉。兩浙財賦之邦，必有銜命至者。郡守錢穀往來，易開罪罟。傷嫩之羽，色舉非屬過計，閣下以為然否？偵彼中無大棘手，控而不得，當勉強奉檄。若牽制多端，遁思決矣。”《與浙江李按院》說：“自壬申遭譴，迄今十三年，靡歲不在苦海浮沉，精力消耗，疾病纏綿。自春徂冬，益困藥餌。因念紹興非易治之郡，太守豈養疴之官。與其臨局貽誤，何如先期引避。”又《與浙江按察路修祺》說：“髮種種矣，闔口直腸，安能再仰中貴人鼻息？遁思已決。”諸此纔是他告休的真正原因，也是弘光政權無可救藥的癥結之一。

福王如此，相繼的魯王、唐王何嘗不是如此。眾所周知，魯王就監國位，唐王稱帝福州，互爭真偽，叔侄反目，勢同水火。唐王建元隆武，本想虛心求治，當一個名副其實的中興皇帝。但是，怯懦庸弱的本質決定了唐王無法擺脫鄭芝龍等武將的擺布。鄭氏集團，同樣是肆意搜括，賣官鬻爵。有正義感的官員不能施其才能，隆武朝的政治前途，不言而喻。王忠孝有鑒於此，在隨唐王駐蹕建寧時，曾奏《上唐王條陳六事疏》，從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提出了實現中興的具體施政方略，並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存在的致命弊病。其“六事”為：

一曰：用人宜慎。從來勘亂致治，先在得人，擇而後用，無用而後擇。……今朝可夕否，東推西移，坐席未暖，幹辦奚從？

一曰：佈置宜審。凡運籌制敵，必先畫定規模。……恢復大事，為當以漸。而上意又喜在旦夕掃蕩，命遣四出，勦閣并峙，而皆提數千烏合之兵，勢分力弱，過敵不支，何怪訶潰之屢聞乎！則併營厚集，慎擇大帥，尤今日一大急務也。

一曰：額餉宜核。用兵伊始，日費萬千。生節無道，困窮立見。……臣察錢糧有起運，有存留。無已，於存留等項，酌其緩急，細加釐節，仍於衛所額糧，屯寺舊藉，力清虛冒，庶幾得一分，猶藉一分之用。萬不可向二三窮黎再行敲吸也。

① 同上。

② 同上。

一曰：將領宜汰。國家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之賢否。……將領既多，薪水雜流，居其強半，欲兵之強，胡可得乎？今欲練兵，先須汰將。

一曰：言路宜清。言語通塞，治亂之源。……凡有條陳，擇裨益時政者，即為進封。部覆之後，務使實實施行。

一曰：圖治宜實。……況時事倍艱，一點精神，俱宜注之興復；一毫物力，俱宜留作兵餉。而臣觀行在規恢，鋪張畢具，賞賚無節，即始之六飛遄發，從官太多，扈侍將吏，無益征剿，徒滋糜費。

唐王閔奏批覆：“王忠孝這奏六款，皆切中時弊，真實可行。”然實際則無法施行，這從後來王忠孝奉命巡視仙霞關的回奏文中得到了印證。

其次，由於該抄傳本甚稀，故收入的王忠孝與鄭成功的十二通書翰及與鄭鴻逵、鄭泰、甘輝、張煌言、周鶴芝等明末重要抗清將領的信札，長期以來鮮為人知，可為學術界研究鄭成功等及其抗清活動，提供新的參考資料。

例如：王忠孝與鄭成功堪稱知交，他也是可對鄭成功直言的少數人之一。王忠孝在入鄭成功儲賢館前後，對鄭氏軍政多所籌策，尤其是對鄭氏軍隊在征戰過程中的撫民問題，最為關注。不必諱言，鄭成功率眾起兵，將士中尚有其父鄭芝龍屬下“海盜”式的餘部，再則偏處海隅一隅，僅以彈丸數島為抗清基地，在清軍的封禁下，勢必常為軍餉缺乏所困擾。為了求生存、圖發展，被迫採取武力征餉或默認擄掠之事在所難免，特別是對一些不服征餉的城寨。王忠孝曾多次致書鄭成功，力諫要以民為重。《與國姓書（八）》說：“沿海生靈，皆外府專官撫輯。歲定額賦，寧輕毋重。輸納有理，是亦今日切務也。”《與國姓書（九）》又稱：“軍中舉動，關民命國脉。而心思之利害，是非自見也。以為然否？”《覆國姓書》再次懇請：“瀕海居民，有前梗而今欲順者，不妨先示誠諭，使知悔輸。頑不能馴，鋤之未晚，勿遽勤臺旅也。”他與鄭成功手下大將甘輝的書信中，也談及撫民的問題。《與甘萬二將軍書》曰：“敝鄉沙格，僻在內地，萬一旌旗責臨，並祈禁斥保護。年來義舉株連，禍及鄉族，此日不容隔膜視之也。”《覆甘提督書》曰：“大抵得城之後，不能不計餉糈，而亦以平定寬大為先。額數太多，則民力不堪，惟取圖籍打算，自有設處之法，勿太擾耳！以為然否？餘事若濟，郡中生靈，萬祈慈航。”諸此諍言與建議，大都為鄭成

功及其主要將領所接受。後來，在鄭成功的軍中，擄掠、焚殺、奸淫等違反軍紀之事，雖未完全禁絕，但鄭成功屢屢申令嚴戒，頒行《出軍嚴禁條令》等。對於一些不識字的官兵，則由付翼司哨書記逐句解說，曉諭遵守。所以，鄭成功在長期的抗清斗争和收復臺灣的過程中，均能得到廣大民衆的大力支持和衷心擁護。

王忠孝的書翰中，還提及他對鄭氏叔侄兄弟之間矛盾的擔憂。他的《與定國公鄭鴻逵書(一)》稱：“顧近有欲批瀝者：初時患叔姪异同，今形迹既捐矣；初時患持兵坐守，今端倪已動矣。所慮攻而不知守，勝而不肯，先為不可勝，敵人卧榻眈眈，而我泄泄視視，有是理乎？……叔調度於內，姪馳驅於外，可遠可近，可南可北，恢復實始基之。何台臺之躊躇不決也？或別有說者：謂令姪未必專權相界，故前旌猶遲。夫渠既懇速命駕，安有肘掣之理？即果肘掣乎，謝而去之，未為晚也。”為了協調鄭鴻逵與鄭成功之間的叔侄關係，曉以利害，動之以情。《與定國公鄭鴻逵書(四)》曰：“邇者，昭明令兄與澄濟令弟，偶有小闕，祇緣貨船互絆。原非難了之局，旁激不已，浸尋干戈，島上日惴惴不寧。……適國昆玉，披纓調停，弟輩亦貽緘贊釋，希旦晚敦睦如初。獨為台臺情屬脊令，更切遠念，乞貽教數行消釋之。骨肉至情，言勝朋侶萬萬也。蓋閩粵義旗，惟尊府為先，匡扶伊始，指臂誼聯。而同枝相闕，恐生觀釁，高明故自照悉，弟輩亦不禁隱憂耳。”又對鄭氏兄弟的爭鬥憂心忡忡。他在《與閣部曾櫻書》中，還懇請曾櫻出面調解鄭氏家族內部的矛盾，曰：“居恒有一宏願，鄭門現三大枝，各懷意見，指臂不靈，肯使同志協力？現在諸公，日與周旋，老祖為一主盟，微論軍機，可參末議，即民隱亦得時達，其如當事先自畛域何？……忠孝交淺言深，婆心空切。老祖臺尊而且親，向大有造於諸公，際此艱危，不妨耳提而面勗之。”

其三，現存的王忠孝詩文殘篇，除了可補正史事之外，還可從中窺見其生平交誼、思想抱負、文學創作及寓臺的感受等。茲亦略舉數例，以概其餘。

他的懷念故國、獨抱忠貞的詩作，沉鬱悲烈，具有典型的明末遺民文學風格。如《甲申聞變》詩云：“拜相四十六，言語日嘵嘵。不思圖君父，門戶爭蟾蜍。……有君嘆無臣，誤國在百僚。都民遭涂炭，九廟悉翹翹。”哀明朝之衰亡，怨奸臣之誤國。《島上除夕》曰：“義不帝秦誰遠蹈，心甘忘漢豈同仇？歲除莫溯從前事，新唱

明朝復旦籌。”《自述》詩又說：“魯連未辭東海去，依然吾道在滄洲。”敘述了自己避居荒島，勁節不改，為報家難國仇，決心效法魯仲連，忠貞不渝，匡復明室。

他的抗清詩作，慷慨壯懷。如《即事有感》詩曰：“憂國念深慚抱杞，匡時力殫空懸旌。尊前偶話疆場事，彈劍悲歌不勝情。”《憶昔》詩說：“單騎立邊關，賜劍壯行色。報命典奉嘗，憲地擢揚歌。”《鷺中移民作戰場》又云：“空營誘敵布先聲，水國遷民恍遠征。深羨將軍勤征伐，自憐疏老拙經營。天風落日吹晴浪，漁火連山擁古城。誰是烹魚願溉釜，寂然悶殺是孤臣。”當年廈門空營誘敵的壯烈抗清場面，躍然紙上。

他的思鄉思親之作，觸而興之，愁緒濃烈。如《林中借宿》曰：“亂東何處是吾家，借得一枝傍水涯。睡去忽生舊國夢，醒來月色床前斜。”《舟中聞笛》又云：“孤帆纔發月光圓，何處飛聲萬棹寒。一曲梅花吹客思，故園榛莽幾時看。”因避戰亂，孤身飄泊，無家可歸，只好把思鄉思親之情，下託流水，上寄明月。

他的寓臺詩文，更是難得可貴。由於受根深蒂固的封建倫理綱常的局限，他在鄭成功逝世後，依然把臺灣的鄭氏政權看作是明祚的延續。其《居東首春遙祝聖躬二首》中，就有“遐方布淑氣，海外猶朝宗”和“小臣無以報，遙挹漢官儀”等詩句。《東方首春有懷》詩，更是唱出了“問余何事渡橫流，為個綱常割不休。歲曆忽頒懷舊闕，春英乍放警新籌。江山別創雄風壯，書劍猶存灑氣留。仁見陽和迴北谷，何愁吾道付滄洲”的心聲。他還在《東寧上帝序》中寫道：“東寧僻處海東，向為紅夷所據，土夷雜處，散地華人，莫肯措止矣。間有至者，多荷鋤逐什一之利，衣冠之侶未聞也。賜姓撫茲土，華人遂接踵而來。安平東寧，所見所聞，無非華者。人為中國之人，土則中國之土，風氣且因之而轉矣。”在《東寧風土沃美急需開濟詩勗同人》詩讚曰：“巨手劈洪濛，光華暖海東。耕耘師后稷，弦誦尊姬公。風俗憑徐化，語音以漸通。年來喜豐稔，開濟藉文翁。”熱情地歌頌了鄭成功收復臺灣之後，掀起了閩臺移民的新高潮，肯定了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人為中國之人，土則中國之土”；並用“巨手劈洪濛，光華暖海東”等詩句，來襯托臺灣人民拓墾之初的艱難與氣概，寓意鄭成功像太陽一樣，賜福臺灣，衷心地讚美了中華民族開發祖國寶島臺灣的不朽業績。